

文庫博物館專集（四十二）

• — • — •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一六一期 ——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9812b)

1.【广阔天地】	老三届与上山下乡	刘小萌
2.【往事如烟】	我的北京知青朋友	高建群
3.【研究报告】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三）	宋永毅·孙大进

《华夏文摘》是由CND义务工作者提供的免费服务。订阅或停订本刊的方法请参照本期文摘的封底。意见和建议请寄：cnd-cm@cnd.org；来稿请寄：HXWZ@cnd.org。由于本刊编辑人手有限，来稿请只用电邮寄纯文本文件。请在来稿中注明您的姓名和电子邮址（如愿用笔名或不署名也请注明）。若是文摘，敬请详细注明原稿的来源和出版时间。

本刊所载的任何形式的稿件均不一定代表编辑、《华夏文摘》或CND的观点。

凡原载于本刊的文章，除非本刊另有安排，不得转载。如欲以公用目的网络服务站对本刊进行收集存档，或以任何方式对本刊再传播，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并取得授权。未经本刊许可，不得利用本刊或本刊存档从事任何形式的营利性的或收费的活动（包括广告宣传在内）。

【广阔天地】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老三届与上山下乡

• 刘小萌 •

“老三届”学生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也曾是新中国教育出来的最成功的一代。

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所倾注的狂热，至少在初期，丝毫不亚于对红卫兵运动的参与。这不仅与“文革”前城市青年的普遍消极态度形成鲜明对照，而且为以后的历届中学生所罕见。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他们所受的系统教育和“文革”初的特殊经历是分不开的。

他们是从建国到“文革”这17年教育成败得失的集中体现者。在他们身上，这种教育中积极的、进取的一面，与盲从、狭隘等消极的一面，都表现得非常鲜明。国内外研究中国“文革”问题的学者，多认为“文革”期间红卫兵种种异乎寻常的表现与17年的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认为这种教育是引发“文革”动乱的重要原因。今天的人们，也仍在从“老三届”学生的人生道路中，不断反思17年教育的利弊得失，希望从中探索可资发扬或引以为戒的经验教训。

无论对17年教育（这里主要是指政治灌输和品德培养）持肯定还是否定态度，有一点是为人所公认的，那就是它曾经成功地塑造了一代甘愿为革命理想而奋斗，而献身的青年。这种理想，首先是基于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代青年从呱呱落地时起，耳畔回旋的便是对领袖的颂歌。入学时学写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近乎胎教的灌输，对他们以后的成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以阶级教育、革命教育为主的前提下，17年教育注重培养的是青年的集体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德和勤奋、刻苦、勇敢、向上的素质。“老三届”中很多人在经历“文革”及以后上山下乡的种种人生困厄和磨难时，能够以坚忍的意志和互相扶助的精神与命运抗争而不甘沉沦，与他们受到的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

但是，17年教育的两重性，也使整个国家乃至受教育者本身尝到了苦果。首先，对雷锋等英雄人物献身精神的宣传，是与对领袖的盲目崇拜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学毛著、背语录成为时髦，随着新闻媒介把对领袖的尊敬和忠诚绝对化，青年学生对领袖的情感被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所扭曲，最后发展到如醉如痴的狂热地步。再者，关于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育，同“反修防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原则紧密结合在一起，学生们的政治热情被引上歧途，蜕变为一种盲目、狭隘、偏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60年代上半期，整个思想理论界极为封闭，政治观点日趋偏激，青年学生除了被动接受之外并无鉴别、思考的余地，在“反修防修”、“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做世界革命的促进派”之类豪言壮语的背后，隐蔽的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对人类文化价值的极端无知。这直接导致了“文革”中红卫兵运动的种种暴力和破坏行为，对尔后兴起的上山下乡运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另外，17年教育关于集体主义的宣传是与对青年个性的压抑联系在一起的。在革命理想主义化身的雷锋身上，突出宣传的是“甘做革命螺丝钉”的思想。从本意上说，把个人比作社会这架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立足于本职工作，努力为人民多做贡献，是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但把它加以极端化的导向则使事物超越了“度”而变质。当年风行一时的名言“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便是扭曲个人与集体关系的一个“杰作”。而“文革”中倡导的“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的口号，则是“螺丝钉”口号的发展。

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的一代青年学生，早在学校时期已不甘寂寞。毛泽东对毛远新、王海蓉等人发表的抨击“旧教育制度”的几次谈话，很快在部份中学生中暗暗流传，其立论的新鲜大胆，使青年人的心激动难抑，他们中的敏感者已经嗅到了“山雨欲来”的气息，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平地而起。

1964年、1965年前后，有关批判资产阶级的活动已经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的中学内小范围地展开，一些干部子女组织起独立于学校党、团的小组织。

1965年，北京市西城区曾发生一起“四六八学潮”，是一次比较典型的事件。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在全国范围已掀起高潮，教育部门也抓了不少忽视德育的典型，提出一些问题。这引起一部份学生的关注。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部份学生以干部子女为主，进行了串联，组织了罢课，给中共中央写了“进言书”。主要要求有两条：

一条是真诚地希望到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在这方面，毛泽东对毛远新的谈话无疑是一个公开的号召。毛指出：“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阶级斗争是一门必修课。”“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处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青年学生完全接受了上述观点，上阶级斗争“主课”的愿望十分强烈，并戴着“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观察周围的事物，发现“阶级斗争”不仅存在于社会每个角落，也存在于学校中。于是要求向中学派“四清”工作组，要求亲身参加“四清”运动，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

“进言书”的第二条，是尖锐批评现行教育制度，认为它是在鼓励学生为分数、为考大学而学习，而不是为革命而学习；培养的目标是“学而优则仕”，是成名成家，而不是引导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由于教育方针有问题，造成学校中不讲阶级路线，地主资产阶级子女、高级知识分子子女因学习好受到老师的赏识，在学习和入团等方面都受到照顾。这些青年学生强烈要求在学生中推行阶级路线，并在学校建立类似于贫协的阶级组织。“四六八学潮”是极左思潮在青年学生中的一场骚动，实际上是红卫兵运动的一次预演。

一年后“文革”狂飙乍起，率先冲锋陷阵的就是“老三届”中高干子女组织的红卫兵。红卫兵运动并非事发偶然，某种意义上说，它正是1957年教育之树结出的一个硕果。而不久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起，则是红卫兵运动的延续。

无论是充当毛主席的红卫兵，“像勇敢的海燕一样”在“文革”风暴中翱翔，还是自告奋勇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安家落户，“老三届”学生矢志以求的都是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因为谁都知道，毛泽东曾就培养接班人途径做过明确说明，即这样的接班人只能在群众斗争中产生，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1967年11月，当北京千余名中学生报名奔赴内蒙和东北时，就有人向《兵团战报》记者表示：“内蒙、东北是反修前哨，环境最艰苦，阶级斗争最尖锐复杂，也正是需要人去改造，去斗争，只有在艰苦的环境里才能锻炼出坚强的接班人。”

不过，许多学生当初未必认真思考过，“接班人”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实际上，毛泽东所指的“接班人”，并不是普通的工人、农民，而是可以信赖的掌权者，是领导干部。所以他的关于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规定：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培养“接班人”始终是大肆宣传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之一，但它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却消失殆尽。事实一清二楚，绝大多数青年下乡后只是充当简单劳动力，真正能成为“接班人”的却寥若晨星。

对毛泽东的迷信与崇拜，也是“老三届”学生积极卷入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精神动力。前文提到，青年学生这种人格上的缺陷在“文革”前已经铸成，“文革”的到来，只不过给它提供了恶性发作的机会。在这方面倡导上山下乡的“造反派”学生领袖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在运动初期，他们都有过一段受“迫害”、身陷囹圄的经历，只是由于毛泽东力挽狂澜，才使他们在政治上获得“新生”，一跃成为令人钦佩的“革命造反派”。这种颇带戏剧性的变化无疑增加了他们

对毛主席感恩戴德的深情。所以，红卫兵报纸在报导曲折、何方方等人主动下乡事迹时，总是会画龙点睛地提到：“是毛主席解放了曲折”，是“毛主席把何方方等革命小将从白色恐怖的深渊里解放出来”。

的确，以他们为代表的“造反派”学生对毛泽东的热爱最初也是比较抽象、比较概念化的。一旦毛主席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为他们平反后，才真正从内心感到他的英明、伟大，才会发出“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才觉主席亲”的感慨。这种个人崇拜，不能不带有鲜明的政治功利色彩。因此，当他们认定上山下乡是毛主席指出的“最革命道路”时，便会毫不犹豫地跨出关键的一步。其实，即便是普普通通的学生，当他们主动申请到边疆落户时，又何尝不是把这视作向伟大领袖“献忠心”的具体行动。一位署名“毛主席的红卫兵”的毕业生在诗中这样写道：

红卫兵，志气大，千难万难咱不怕，
主席思想来指引，天大困难征服它。
树雄心，立壮志，誓在边疆把根扎；
祖国需要是理想，主席指哪哪安家。
红卫兵，心最红，紧跟统帅毛泽东；
一字一句不走样，一言一行无限忠。
天不怕，地不怕，为革命献身没有啥；
哪有困难冲向哪，最最幸福只是它。

与冲锋陷阵、叱咤风云的红卫兵一样，在第一批投身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弄潮儿中，用“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看待周围世界的仍大有人在。在赴内蒙古前夕，何方方曾激动地向毛主席发下誓言：“要继续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肃清草原上最大走资派乌兰夫的流毒，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于是，狂热的青年学生一到草原，便迫不及待地投入“火热的阶级斗争”。在短短几个月里，就经历了复查阶级、重新划分阶级、整顿贫协等几项大的政治活动，并把“暗藏的阶级敌人一个又一个地揪了出来”。甚至像红卫兵搞过的“破四旧”、抄家之类的极端做法也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草原。

无论是狂热不羁的红卫兵领袖，还是上山下乡一呼百应的带头人，在他们身上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气质。一般说来，他们大多是学生中的佼佼者。学习成绩好、政治素质较高，有的是班、年级、学校的学生干部，有一定的威信和较强的组织能力。而他们的优点与缺点并存，又往往与“文革”前的教育息息相关。至于说到最先卷入上山下乡运动的普通学生们，情况却相当复杂：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年龄相差悬殊，从16岁直到20岁出头；本人政治面目，家庭出身以及“文革”初的经历，更是形形色色。只是基于上山下乡的共同愿望，才使这些素昧平生，本来应有不同人生道路的青年学生走到了一起。

不过，在共同愿望的背后，每个人的考虑却各式各样：有的“造反派”学生是为了在一场新的革命运动中“再立新功”；有的老红卫兵自以为前段时间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真诚地希望在三大革命运动（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弃旧图新”；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文革”初受过冲击或羞辱，他们希望通过下乡，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胎脱换骨”的改造，以取得加入革命队伍的资格。诸如此类的考虑，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以往思想教育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另外，长年“逍遥”在家，感到无聊之至；明知在城市升学、就业之路被阻死，不如早走为佳，等等，也都是促使一些学生主动报名下乡的动机。在当时社会氛围高度政治化的条件下，这样的动机当然不会公开展露出来，而是用各种炫目的革命口号包装得严严实实。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往往越是“文革”前的重点学校，学生中报名下乡就越踊跃。

原因之一，重点校学生总体素质高，而且生源以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居多。这些子弟，学习成绩多属上乘。干部子弟的特点在于，早熟的参政意识、敢想敢为的勇气和较强的活动能力。由于学校、社会给予他们以特殊的信任和器重，因而使他们形成了强烈的接班人意识和政治上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要成为合格的“接班人”，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为此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至于知识份子子弟，由于60年代初在学校中大力贯彻“阶级路线”的结果，他们身上的孤傲习气早已渐灭殆尽。“文革”前，他们的出路主要在于升学，加之家庭环境的濡染，大多勤奋好学。尽管在政治上时有压抑之感，但在学校政治教育的灌输陶冶下，也不乏革命热情。他们处世较多书生气，考虑问题远不如深知柴米油盐之艰辛的工农子弟实际，所以面临上山下乡的选择，往往不瞻前顾后。

原因之二，重点校报名下乡的学生较多，是这类学校高效率政治教育结出的一个硕果。以北师大一附中为例：60年代初校方即认定，学校里走“白专道路”的学生多，必须大抓思想政治教育。随即在学生中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革命化”活动，反复宣扬侯隽、邢燕子等人事迹，积极提倡“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大力培养“又红又专”的样板。“功夫不负苦心人”，当上山下乡运动呼之欲出之际，该校的“旧党总支的红人”、班级学生干部、学生中的“红专”典型、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的榜样等等，多数加入到上山下乡自愿者的行列，足见政治思想教育卓有成效。北师大一附中的情况，在当时的重点学校中应是有代表性的。

红卫兵们对上山下乡表现出的狂热和执着与“文革”前的老知青们形成截然不同对照。60年代初学校中宣传的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在升学和下乡两种准备中，升学是第一位的，下乡是第二位的。国家明确规定，上山下乡的基本对象是那些高考落榜、在城市中又无法就业的青年。这些青年只好以城市升学就业竞争失败者的身份走向农村，不可避免地带有羞辱的标记，自然也就很难踌躇满志，振作起精神。“文革”爆发，一时赋予上山下乡运动以崭新的面貌。它被看作是继红卫兵运动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被说成是革命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最激进形式。由于升学、就业之路基本被堵死，主动要求上山下乡的学生们不仅不会萌生老知青那种难堪的被淘汰感，反而会以时代弄潮儿资格睥睨一切。当“文革”前的城市青年高呼着“大有作为”口号走向农村时，很多人是言不由衷的。但“文革”中的这批弄潮儿每当诵读到毛泽东的那段著名语录：“我们这一代青年，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时，却无不热血沸腾，壮怀激烈，他们在下乡时以搏击长空的雄鹰自比，以划破暴风骤雨的海燕自励。他们天真地以为，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革命洪流中，自己勇敢地站到了最前列。

□ 摘自《中国知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

来源：《新世纪》 1998 / 10

~~~~~

【往事如烟】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我的北京知青朋友

• 高建群 •

陕北的这代作家，都受到北京知青的重要影响。典型的例子是路遥。有个北京知青叫陶正的，自己下来时背了个油印机，自己写文章自己发表。这令回乡知青的路遥知道了世界上还有一项营生叫写作。路遥的初恋是一位北京女知青。《人生

》完稿的那一天晚上，路遥曾热泪涟涟地给我讲起他的初恋。路遥后来与另一位北京女知青结婚。

我小这一茬知青两三岁。30年前那个飘着雪花的日子，三万名北京知青坐着大卡车来到陕北。我当时站在欢迎的人群里。我记忆最深的是这么一件事。一个男知青花八块钱买了一条驴。“这么大的个东西，才八块钱！”知青很惊讶，就把它买下了。接着，男知青牵着驴，女知青一个一个地骑它，像闹秧歌、耍社火一样，在县城的街道上转了半下午。后来，驴高低不走了，任凭知青们喊口号，踢它，就是不走。旁边一个老乡说：“这驴是饿了！”“驴也会饿？！”知青们很惊讶，他们大约只玩过玩具动物的驴。老乡为驴鸣不平起来，他说，“你都会饿，驴不会饿！”听了老乡这话，那些漂亮的女孩子们，于是纷纷从自己的黄挎包里，掏出糖果、饼干、面包，往驴的嘴里塞，其状可掬。

我有许多的北京知青朋友。如果将他们一一写出，会是一篇大文章。诗人高红十是我的朋友，我们20年前在延安市办的创作学习班认识。那时红十已经和她的北京大学同学，写出那首著名的《青春之歌》，人民日报发了一整版，成为知青运动的宣言书，而红十本人也成为知青运动的风云人物之一。

1994年秋天在北京，红十大姐请我吃饭。那是一个黄叶翻飞的日子。我们去的地方是张自忠路口的老三届餐厅。类似这样以知青命名的餐厅，北京还有两个：老插餐厅和黑土地餐厅。席间，从第一批知青薛喜梅、邢燕子、侯隽，一直谈到了后来的许多知青，谈到这一代人后来的命运，感慨颇多。而窗外翻飞的黄叶，此刻令人想起俄罗斯天才诗人叶赛宁的两句话：金黄的落叶堆满我心间，我已经不再是青春少年！——记得当年，我把这诗背给路遥后，这两句诗成为他的口头禅，并好像写进他的《平凡的世界》里了。

写出《我的心儿在高原》的诗人梅绍静是我的朋友。她好吗？这位命运多舛的才女、艺术的殉道者。写出《干妈》的诗人叶延滨是我的朋友。还有作家陶正。哦，我这时候想起陶正的一件事。1982年秋，为纪念陶正他们办的那个小报多少周年，陶正回到他插队的那个村子。他上了坡坎，突然老乡放了一个狗来咬他，他吓坏了，连滚带爬跑下坡来。站在坡底，他又喊。他说老乡明明看见他了，就是躲在门后面不出来，这使他很纳闷。后来，见他不走，终于有一个婆姨走出门来，站在窑畔上喊：“喂，北京娃，你是不是来要你的知青窑来了！”原来，北京市政府当年给每个知青点上，都建有知青窑，陶正走后，这孔窑让这家老乡住了，老乡是担心他来收窑。陶正听了，哭笑不得。

这当然是个别情况。我陪过许多拨北京知青回队，他们对老乡的感情，老乡对他们的感情，双方抱在一起大声痛哭的情景，连在一旁的我都落了泪。有个女知青叫郭林，当年修延安至延长的公路时，她拉的架子车翻了，砸断了两条腿，又到广州重接了一次。我陪她回过队，她一进村子就放声大哭，半天的时间，她把每户人家都走了一遍，给每家都放上二百块钱。她搂着房东大娘哭得死去活来，一边哭一边说：“大娘呀，我以为我再见不上你了！”至今我写这短文时，我的眼睛也潮湿起来。

当年赴陕北插队的3万北京知青，尔今留在陕北的，只剩300人了。这是为了写这篇短文，刚才我打电话问延安的。哦，300壮士，高原的最后守望者，我想我的笔更有理由向你致敬。

□ 原载《生活时报》九八年六月八日

~~~~~

【研究报告】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三）

• 宋永毅 • 孙大进 •

（续上期 总论：异端初露，思潮迭起的中国文化大革命）

二．正论：异端思潮对文化大革命的独立思考

文革历史的复杂与怪诞，匪夷所思般地孕育了异端的萌生，而这些异端一旦形成惊视骇听的社会思潮，便又成了种种不容漠视的历史存在。它们间的关系，一个是悖论，一个则是正论。

现在，我们可以从正面来审度一下这些异端思潮的嬗替更易、变革沿流，研究一下它们究竟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离经叛道的精神探索，给中国当代思想史留下了一缕什么样的一以贯之的文化血脉，以及为什么中共当局要如此惊恐万分地对他们一概剿灭扼杀？

追求人权，追求人生来具有的平等的社会权利——在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况下，主要是追求平等的政治权利以及受教育的权利——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某些异端思潮的一个主要诉求和内容，这一诉求的杰出代表者，首先是遇罗克与他的《出身论》等一系列论著。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共当局以它所谓的“阶级路线”，实际上已经将一大批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年排斥于高等教育的校门之外，同时，无论在工厂农村，又无论在提升，工作分配，经济待遇甚至选举与被选举权上，都已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歧视性的种姓制度。如《出身论》所统计，即使按全国地富反坏右分子只占5%的比例计算，加上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等，估计会有近亿人口处于被歧视的社会“贱民”阶层之中。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一切都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里，如果没有平等的政治与受教育的权利，那么这些“贱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只能生活在这一被歧视的社会底层。中共之所以推行这样一条“阶级路线”，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为他们子女搞荫封制；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制造“阶级斗争”与“阶级敌人”的神话，为了巩固他们的专制而设置一个集体仇恨的倾注面。在十七年专制的重罗密网之中，这种极为不平等的人权歧视非但没有引发一丝公开的抗议，相反歧视者们还远嫌不够。在公开的舆论中永远重复“歧视阶级”受歧视的谎言：所谓“工农革干子女受迫害论”。遇罗克以及“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伙伴们一开始就冲破俗套揭穿了中共故意混淆是非的做法，指出受歧视的并不是所谓“工农革干子弟”，而是“出身不好的青年”：“每年大学招收完毕，前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则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难道这就是‘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了吗？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受优待。不少大学设立‘贫协’一类组织，与团组织并列。这次运动开展以来，有禁止黑五类子女串连的，有用出身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的，有借出身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样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就是常事。”《出身论》大声疾呼：“‘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得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象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25】遇罗克笔锋仍没有至此顿住，他又进一步揭露了中共当局之所以这么做的真正目的正是为巩固他们的统治：“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化，以便分而治之。例如他们把教员和学生的矛盾，干部和工人的矛盾，低级干部和高级干部的矛盾，出身好和出身不好的矛盾，等等，这些非对抗性的矛盾扩大到对抗性矛盾的地步，‘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挑动一部分人斗争另一

部分人。”〔26〕

遇罗克的《出身论》等论文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不同于家庭影响，出身不同于成份等角度批判了中共虚伪的“重在表现论”。它利用马克思关于“解放全人类”的观点反唇相讥那些“血统论”的卫道士们：“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深究这一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原因，遇罗克又鞭辟入里地指出：“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什么是《出身论》的结论呢？那便是“平等”——“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了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27〕——当遇罗克用他的血与生命写下这怵目惊心的“平等”二字时，他实际上已使“出身论”越出了马列主义，尤其是毛泽东思想的樊篱，因为在这一理论体系里，不同的阶级以及阶级出身的人群中，从来是不能用“平等”，而只能用“斗争”与“统治——被统治”这种字眼的。而“平等”，历来是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口号被毛泽东们加以批判和鞅伐的。

实际上，在所有异端思潮的倡导者中，遇罗克可能是极少数的几个除了马列主义外还深受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的人。1960年后数年内他因家庭出身之累被中共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在社会大学里读了大量西方哲学著作，其中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使他最为神往。这里是一位他朋友的回忆：

一个寒冬之夜，窗外飘着雪花。屋里暗弱的灯光下，脸盆里残水结冰，一阵阵寒气袭人。就在这时，罗克披着棉袄走进那位青年的屋里，他举着一本书，连声赞叹：“写得太好了！你也应当看看。”

原来是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你看这段话说得多好啊——‘法学家既郑重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太彻底了。”

青年接过书，看到书上有很多罗克写的批语，如“智慧”，“矛盾！”，“不通”，“远见”“无与伦比的文字”……〔28〕

当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在其“第一条”中写下：“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永远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用上面才显出社会的差异”〔29〕时，曾是人类历史上的石破天惊之声。同样，当遇罗克在中共专制的黑暗王国中，尤其在血统论的黑云压城欲摧之际，写下“平等”两个劲犹的大字，并呼吁“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把！”时，同样是中国思想史上的惊心动魄之音。尽管遇罗克一直自诩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论文中西方现代意义上的人权思想之光仍是耀眼的，闪亮的。

承递了遇罗克关于政治权利平等的追求，并进一步把这一诉求推进到健全法制的新高度的，是李一哲的“民主与法制”的思潮。1974年11月10日在广州市最热闹的北京路口贴出了一张题名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大字报署名“李一哲”，实为三个青年人李正天，陈一阳与王希哲的笔名。据目击者回忆：“李一哲大字报轰动广州市，市民围观，水泄不通，车辆改道。入夜还有用手电筒照着读的。大家争相抄录，四处流传。李正天又募集纸张，油印散发，因此流传范围相当广泛。大字报空白处，写满了‘好的很！’‘好！’‘说出真正问题！’‘表达了人民的声音！’‘向李一哲学习！’‘向李一哲致敬！’的读者批

语。而且掀起了一阵拥李和反李的大字报论战热潮。代表人民群众的拥李派占尽上风。”〔29〕为什么李一哲大字报具有《出身论》一样的魅力？是因为整个李一哲思潮的宗旨便是：“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如同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所庄严宣称的那样：“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意见的发表只要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见，甚至信教的意见而受到干涉”；李一哲公开要求中国当时名义上的最高法制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法令：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除了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集团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31〕

——这里，我们还可以特别注意到李一哲所列的“专政对象”是现行刑事犯罪分子，而不是中共的“阶级路线”一贯罗列的“黑五类分子”。这一改动，连批判李一哲思潮的官方代表“宣集文”（广东省委宣传部集体文章）都敏锐地注意到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李一哲开列的‘必须实行专政’的对象里面，一，地主阶级没有了，官僚资产阶级没有了，富农阶级、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及反革命分子也没有了。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疏忽……二，无产阶级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也不见了，于是，一切封、资、修的反动意识形态，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言论，都可以自由泛滥……”〔32〕。这确实不是偶然的疏忽，因为在李一哲思潮中，遇罗克《出身论》的正义之声被升华到了一种法律诉求的高度，人权的概念又已从《出身论》里的出身不好的受歧视的青年扩展和延伸到一切受迫害，尤其是在文革无规则的权力斗争与派别斗争中受害的群众。与《出身论》还只是在文字上批判“联动”等血统高贵者的法西斯行为不同，李一哲第一次提出了人民的法律惩治的要求：“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制裁那些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制造假案，公报私仇，私立专案，私设监狱，大兴肉刑，草菅人命，罪恶极大的‘大夫’们的条例。”

关于遇罗克所表达的平等的受教育的思想，在李一哲的深切关注中以“限制特权”的诉求得以弘扬的。出现于七十年代初的所谓“工农兵学员”制度大多成了特权人物“开后门”（即送他们子女上大学）的场所，因而李一哲们指出：“文艺，教育，‘五·七干校’，上山下乡，吐故纳新，上大学，培养接班人等等，几乎每个被人们称之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为特权显圣的场所”，为之，李一哲们呼吁“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限制特权的条文。”从《出身论》到“李一哲大字报”的嬗变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权的思想，即维护中国最底层的人民群众的平等的政治权利，受教育的权利，不受政治迫害的权利，正在健康地发展，逐步地升华。既然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褫夺人民的人权本质上是一个制度问题，而遇罗克，李一哲们制度内的正义诉求完全不可能得到中共的善意回音（只能换来子弹与牢房），那么这一不可遏制的人民的诉求又将走向何方呢？答案恐怕也是显而易见的。

追求民主，追求人民群众对于这个国家实际的管理权利，这是异端思潮的第二个主要诉求。这一朦胧的诉求，首先是以追求新的政体——巴黎公社式的新型国家政体为目标的。如前所述，关于文革的目标是“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原是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对人民的一种承诺。处于一潭封闭的死水式的思想环境下的中国民众，恐怕实在不知道除了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外，世界上和历史上还有什么新型的民主政体。但“民主”二字对于处于十七年专制的沙漠中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具有天然召唤力的绿洲、甘泉；哪怕它实际是一片海市蜃楼的幻影，但也足以使他们铤而走险地为之奋斗了。什么是“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呢？按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内和有关的《巴黎公社史》的论述，主要是：1）实行普选，代

表、官吏可随时撤换；2）法官公开选举，并可调换；3）公社废除暴力，废除常备军，代之人民武装。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还特别指出巴黎公社的本质是“自治”，“是人民为自己的福利管理自己事情”的“自治”。〔33〕用这一标准来衡量中共十七年的一党专政，显然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其实，文革中以建立“公社”代替“革命委员会”的极左派“新思潮”派，他们所坚持的“异端”并没有越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范围。“省无联”在它的《中国向何处去》中坚持的似乎正是马克思的上述主张。第一，省无联思潮主张公社的代表应是“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他们是公社的一员，没有特权，在经济上与一般群众一样的待遇，可以随时根据群众的要求撤换。”不过在“革委会”里，“这些新的有权威的干部还没有出现。”与之相反，大多数群众把文革认为只是一场“连对敌人是一个阶级都认识不清，罢官革命，揪人革命”。更有甚者，“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形式”。第二，省无联们又竭力主张解决中国军队问题：“自下而上搞军内文化大革命，依靠人民革命这一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改变官僚控制军队所造成的军民对立状况。”他们要建立的公社的武装是一支“不同于现在军队”的“新社会中的军事力量”。为此，他们歌颂群众性的抢枪运动以及“城市在一个短时期内处在一种‘武装的群众专政’的状态。大部分工业、商业、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权又从章伯森、华国锋、龙书金、刘子云之流手中转到了武装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从来没有象八月那样以创造世界历史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小学生自动充当交通警卫工作，指挥车辆的英姿，湘江风雷，红中会等群众组织直接控制部分财经大权的自豪，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应当说，省无联们所描述与憧憬的正是一种公社式的“自治”〔34〕，他们的口号“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更完全是巴黎公社式的。而他们对于军队参政的“三结合”必然形成新的更为反动的“官僚复辟”的预料——即对于“一月革命”后军人法西斯官僚体制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应当说是极有洞见的。

与“省无联”相同观点或直接受其影响的群众组织在1967年秋至1968年春在全国大有人在。武汉地区由华中工学院的大学生鲁礼安、冯天艾等人先后组织的“北斗星学会”（1967年11月），“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1967年12月）和《扬子江评论》（简称“北、决、扬”），也坚决主张彻底消灭解放军，并代之以人民武装，还应当推翻“革命委员会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体制”，“并使之过渡到巴黎公社式的崭新的国家机器——真正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正式权力机构——武汉人民公社。”〔35〕北京北师大造反兵团“新思潮”代表李公博等人也含沙影射地指责革委会“从形式上与旧社会资产阶级专政机关是一样的。这种机构是官僚主义和奴隶主义的温床。”〔36〕“就是要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与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构，创立起无产阶级国家机构的新的组织形式，坚决反对‘打倒皇帝做皇帝。’”〔37〕广东地区的代表者是广州八五公社。由于这股思潮在一个新兴的造反派组织“粤海风暴”的小报《八五公社》上表现的最为充分，故又称为“八五思潮”。“八五思潮”认为以林彪集团大将黄永胜为首的省革筹小组是“反动势力”，它们“正在汇成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暗流”。它们提出：“大局未定，大权在争”和“广州还须大乱”的论点，并坚持“干部大换班”而不是省革筹小组的“改良主义”。〔38〕

既然“新思潮”的倡导者们要求人民有实际管理这一国家的权利，他们必然反对目下管理这一国家的中共官僚阶层（用“省无联”们的话来讲，是一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其实，认为中共的干部阶层，尤其是高级干部阶层已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起源于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的理论。1965年，当毛泽东在为他准备中的政治风暴大造舆论时，他曾在一个报告中批示道：“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39〕然后，当1967—1968年“全国山河一片红”——

二十九个省市“革命委员会”广泛建立后，这一“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提法再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正确对待革命干部”。自1968年“清队”以后，只要没有历史问题的干部，全部作为“革命干部”结合进“革委会”。这一“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便随着毛泽东权力斗争的胜利而悄然消失了。如同民间文革史家刘国凯指出：“许多工厂里的‘造反派’对本单位的厂长、书记揪住不放，陈伯达在七月初说：‘军代表在工厂要帮助革命派解放包括厂长书记这样的大量干部，走资派只是一小撮，不是走资派只是有错误认识了就算了，这是中央的方针。’他说得倒轻巧，如果这些厂长、书记都重新官复原职，那批判过他们的‘造反派’今后还会有好日子过？”〔40〕因而，群众和造反派中一部分思想家仍坚持“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一提法，并进行深入系统地分析，形成独立于瞬息万变的官方理论外的“反特权”，“反官僚”的异端体系，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对反特权以及特权阶层的理论作出最初独立阐述是遇罗克。他在正面批判联动的“血统论”的一系列文章里，非正面地论述到了这一与“新的受歧视阶层”处于“阶级压迫”地位的特权阶层的问题。1967年春夏之交，由于批判反动血统论，北京有不少中学生小报上出现了有关特权阶级（层）的文章，随着北京中学生分为四·三、四·四两大派。“四·三”派似乎更注重关于“特权阶级”理论的独立探讨。风行一时的四·三思潮的代表作《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便是这样一篇压卷之作。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指出一种新的“主要的阶级矛盾——革与保的矛盾”，“保”的一方是“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权人物”，反对“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通过一次次‘较和平’的再分配——这必须用一系列的革命化措施及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来保证——逐步缩小各种差别，最后达到财产和权力的真正公有”。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激进派——四·三派则是“对再分配有最激进要求的那一部分人”。他们是一种“不断要‘革’，要向前”去“促成财产、权力的再分配，促成社会的革命变动，打碎特权阶层”。〔41〕这篇文章以及它首先提出的“新思潮”给了一年后震动全国的省无联思潮以极大的影响。1967年省无联的理论纲领《中国向何处去》的执笔者杨曦光在北京串联，接触到这些文章。他后来写道：“去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思想界比较活跃，但有人写《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重建马列主义小组》，《废除官僚机构》及批判现存国家机器，分析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文章，就立即遭到了疯狂的围剿。今年四月江青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思想，北京的中学四三派有几个激进分子写了篇《论新思潮》也被一片批判反动思潮的叫声所淹没”，〔42〕“这些思潮在造反派大学生和北京批判血统论的四三派中有不少支持者。我回想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城市市民对共产党当局表达强烈不满，开始重新思考文革爆发的原因等问题。”〔43〕

作为一种深入反思的结果，发表于1968年1月的《中国向何处去》表达了更为激进更为系统的反特权思想。首先，它认定十七年中：“90%的高干已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利用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的。要实现‘中华人民公社’就必须推翻这个阶级。”〔44〕其次，它又指出：“中国既然已经形成了红色资本家阶级，军队当然不能脱离于这现实之外”。因而“今天革命人民要战胜武装的‘红色’资本家阶级”。与省无联的看法相同，武汉“北决扬”也坚决认为：“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官僚资产阶级……要彻底让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就必须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推翻这个阶级”。〔45〕广州的“八五公社”似不及“省无联”与“北、决、扬”那么激进，却也提出了“干部大换班”和“一切权力归左派”的相似口号。〔46〕

既然占95%的官僚主义者——红色资本家阶级掌握了党权、军权，那么对十

七年的旧的国家机器进行改造乃至砸烂就是必须的了。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1967年底伊林·涤西的《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该文提出：“您强调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不需要改进的一方面，却没有敏锐地觉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突出来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来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创造出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炼，实现得了吗？”在伊林·涤西看来，中国的国家机器应变为“代表中国的东方公社”，〔47〕但是他们并没有指出改善（变）这一国家机器的原因是官僚主义者阶级掌握了这一旧的国家机器。风行于1968年初的全国范围内的“新思潮”更多地主张“应推翻腐化阶级，应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在这里，不能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湖南省无联）；“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武汉“北决扬”）。

既然十七年旧的国家机器要砸烂，原来掌权的95%的高级干部要作为一个“官僚主义者”——“红色资本家阶级”推翻，那么革命要依靠一些什么人呢？这便是流行全国的极左派的新思潮的又一异端理论——“阶级关系变动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新思潮”中，最早正面提出这一问题的是省无联思潮：“真正要使革命胜利，就是要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对发生了‘阶级大变动的最新动态’的中国社会重新进行阶级分析，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团结朋友，打倒敌人”。〔48〕什么是新的阶级关系变动？如何进行这一新的阶级关系分析？除了提出“推翻红色资本家阶级”外，省无联思潮还提供了这样一些大致的分析：保守派自然不是依靠阶级，造反派中不少人虽然也参加了革命，“但是对于这场革命也有不少人很不理解”；因而只有依靠“趋向新思潮，立志改革的激进分子”去重新建党。与省无联相同，武汉“北、决、扬”思潮同样坚信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并在他们那篇著名的《怎样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中，提出了重新组党——以激进分子——“无产阶级左翼队伍”，作为“整顿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队伍”的主张。〔49〕广州的“八五公社”在那一时期也提出了“重新划分阶级”的口号。上海的“反复辟学会”在其“成立宣言”中公开宣称：“中国社会产生了空前的阶级大变动的最新动态。”〔50〕而中串会在其代表作《一切为了九大》中具体阐释这一变动为：“党内机会主义者同人民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的矛盾，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并因此而引起的革命阵线内部的依靠、团结、清洗对象的变动，这就构成了阶级阵线的大变动……非党员要比党员好，非干部要比干部好。走资派排斥了大量优秀的革命分子。”〔51〕应当说，“新思潮”从阶级斗争上确认95%中共政、军干部是一个“应当推翻的红色资本家阶级”以及特权人物；从国家机构上主张砸烂一切中共官僚机构，包括中共及毛泽东最主要的统治基石——军队；在阶级关系上全面否定中共统治最主要的群众基础——干部与党团员，并主张通过全国性内战重新建党建军；尽管它再打着“毛泽东思想”乃至“毛泽东主义”的旗号，甚至“新思潮”的倡导者们仍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独立思考，但其主张的实质及一旦实践的后果必然使毛泽东思想及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体系成为一张没有任何基础的空头支票。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苦心建筑的“全国一片红”的新权力大厦又会崩塌于再次群众运动的浪潮，这便是“新思潮”饱蕴的杀机及其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招致残酷镇压的深层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个别“新思潮”的倡导者们走上了更远更直觉的反体制的道路。1967年至1968年活跃于山东造反派中的所谓“反革命组织”——“渤海战团”便是典型的一例。战团的代表人物丘黎明，王公乾等人在他们的《揭开山东省十七年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盖子》，《关于组织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中这样描绘了山东省的五七年反右斗争：

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冤案、错案，先后株连了一大批革命干部，打击陷害

了大批革命的好同志。……连同‘反右倾’，打击陷害了几十万干部。这些同志中不知有多少人，被无理剥夺政治权利、撤职、坐牢、甚至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至今未给平反，仍戴着“右派”、“反革命”、“反党分子”的大帽子，不能享受一个普通公民所能享受的权利。【52】

因而，他们认为：“十七年来历次政治运动左倾是主要的，57年以来的反右，整风运动，反右倾几乎全错了……十七年来受迫害，受处分的大都是好同志”；“反右斗争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夭折。”他们还公开扬言：“中国的军队，公检法完全掌握在敌人手里，我们要彻底砸烂包括国务院在内的国家机器，重新建党建军。”【53】他们对“新思潮”在全国范围内的产生更有一种自觉的认识：“不论在山东，还是上海，或者是湖南，更不用说北京，不但出现了一些不信邪的激进分子，而且还出现了好些激进的文章。这些激进分子虽是少数，但是思想越来越完整；”“要依靠这些激进分子去重新建党建军。”【54】虽然渤海战团很快便被取缔，但从它的文献中却可清楚地窥见极左派“新思潮”的“反体制”内涵。

与发端于1967年春的极左派“新思潮”相比，从右的方面抵制文革的思潮似乎肇始得更早。1966年底风行于北京的联动思潮被人认为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逐渐觉悟，自发反对错误路线的体现，是‘文革’中人民起来反抗‘四人帮’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行动。”【55】联动由一大批出身高干的老红卫兵组成，在1966年8月当了毛泽东和“江青阿姨”的宠儿完成了街头“红色恐怖”的任务后，因为他们对文革所整的重点——党内走资派，即他们父母的天然抵触，以及他们死抱住不放的“血统论”客观上已成了刘邓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在权力斗争中较量的一个重要政治武器。毛泽东及文革派决定抛弃这些“宠儿们”，并发动被他们执行的“资反路线”“压制的一大批群众起来造反取而代之。对于这一大批不可一世，自负好斗的贵胄子弟来说，被利用后被抛弃，每被批判的滋味当然不是好受的，他们“愈来愈感到味道不对头，革命似乎革出鬼来了。自己的老子执行了资反线要作检查挨批判。更可怕的是那‘走资派’的帽子竟总在自己父辈们头上盘旋，不知什么时候会飞下来扣个正着。他妈的！这是怎回事？‘革命’，这个词本来是那么潇洒写意。老子们天生下来就是革命者！老子们的老子革了旧中国的命打天下，是英雄。今天轮到老子们继承父业去革那些‘黑六类’，‘狗崽子们’的命，是好汉。抓、抄、打、游街、随心所欲，何等快意！革命的涵义本来就理当如此，何为现在竟节外生枝，搞起什么批资反线揪走资派来？这也算是革命？革谁的命？随着批揪声浪的高潮，一切伦理关系都在改变颠倒，过去那些连大气也不敢出，低眉顺眼的狗崽子们神色自若了，尤其可恨的是那些‘灰色阶级’的混蛋们竟大模大样口出狂言，而自己那一向令人钦慕的高干子弟地位正在向黑帮子弟转化。‘黑七类’之中的老七就要由自己去充当，自己就要从社会金碧辉煌的最高层跌入最黑暗凄凉的深渊！……为什么灾星会出现在自己家庭的上空？为什么自己的境遇越来越不得意？为什么从前的少数派这样肆无忌惮耀武扬威？”【56】在被利用被抛弃后的自身痛苦经历的独立思考中，作为文革牺牲品的联动萌发了对文革，对中央文革乃至对毛泽东的强烈不满。这些不满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他们要求河归旧道，即回到十七年的中共专制（“一九六五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第二，他们要求文革不触及十七年的官僚体制（即“反对揪斗革命老前辈”，“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生命安全”【57】）；第三，他们要求抵制对“血统论”及他们执行的“红色恐怖”的批判（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绝对如此”【58】）。平心而论，联动思潮表达了不少极宝贵的思想，例如他们喊出的“取消一切专制制度”，“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等等口号，应当说是文革中第一次把矛头指向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正式挑战。但在文革期间，联

动的行动非但没有引起人民群众的同情与反响，相反在相当孤立中走向失败。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因为人民群众受够了他们“血统论”，“红色恐怖”之苦，而他们没有起码的自我批评，反诬对他们的批评是“新的资反路线”；他们反对迫害中共老干部，但是他们并不反对自己继续唯我独革地迫害普通人民群众（如他们所言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如同北京的一些中学普通群众所认为：“学校中多数同学对‘联动’是反感的，认为‘联动’所为只是一种失宠后的发泄而已……他们出尽了风头，被‘中央文革’捧上天，他们似乎天生具有决定可以斗谁，不可以斗谁和决定命运的权利。当他们自己的父母受到冲击，当他们在学校的领导地位受到冲击后，才打出反对‘中央文革’的牌子，并用极端方式与其他群众组织对立。这使很多人认为，他们只是为着自己一伙人私利反对‘中央文革’的，是想恢复他们自己有过的高居于群众之上不可一世的优越感与特权。”〔59〕这一出自普通中学生之口的评价，应当说是公允的，也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人心向背和为什么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在一九六六年底打“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民意牌会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所在。

紧跟着“联动”炮打中央文革的是北京一些大专院校的保守派红卫兵的代表，这一思潮后来被毛泽东在六七年初称为“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反动思潮。这又是一次规模不小的对文革的公开抵制。其抵制的主要方向是中央文革纵容与支持造反派对他们所执行的批判与斗争。本来，这些保守派红卫兵的代表只不过是既执行了工作组的指示“反右派”，又按中央文革的精神破四旧，抄家，打人的。但中央文革非但没有象一般群众那样给他们一点应有的袒护，相反煽动了两派学生中越来越严重的对立与斗争。当这些红卫兵反中央文革时，使用的武器也是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制定的《十六条》。1966年11月24日，29日，12月2日，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和“野战兵团”赖锐锐等人“连续贴出《一问中央文革》，《二问中央文革》，《三问中央文革》和《也问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对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没有注意团结其他学生，甚至扩大了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学生中的矛盾的做法提出了质问。1966年11月27日，北京林学院学生李洪山贴出质问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和“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大标语。他又在12月1日的辩论会上对中央文革小组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却没有经过群众选举，提出自己的见解；并认为各校组成群众组织，“搞的四分五裂”也是中央文革小组造成的。〔60〕不过数日，北钢，北大，清华，北航，北矿都出现了炮打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与“刘少奇万岁”的大标语。这一思潮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抓住了毛泽东及其文革派打民意牌的假民主，第一次正面揭穿了他们真专制的面目。而这一思潮的失败之处与联动思潮相似：他们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一些执行了“资反路线”的高干子女。由于他们缺乏对执行资反路线的自我批评精神而失去了群众的支持与同情。在群众中造成了一种出自一己私利而反“中央文革”的印象。因而，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很快利用专政机关对他们进行了全面的镇压。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从毛泽东及文革派的重要政治工具——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中分裂出了一个叫“清华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的群众组织，这一组织作为当时响当当的造反派组织的分化物，代表了从右的方面抵制文革最完整最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大都出自该派主要理论家周泉纓对文革的独立思考。四一四派的基本理论正好和极左派“新思潮”的阶级关系变动论相反——“阶级关系不变论”。在四一四纲领性的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中，他们提出：十七年“全体劳动人民是有权的，十七年来掌权的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文化大革命中，决不可能来个‘大翻个儿’，决不可能划分什么‘老保阶级’‘造反阶级’”。因而，他们认为“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造反派可以打天下而不能坐天下”。出于这一基本估计，他们当然要求文化大革命进行“收”，造反派应当作为“革命的同路人”抛弃，整个文革应当进入“修整、巩固、妥协”的“相当长的必要阶段”

。实际上，就是河归旧道于十七年，就是他们所主张的“对刘少奇路线也要一分为二”。

四一四思潮其实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有任何成绩，但周泉纁使用了非常隐晦曲折的历史比喻来进行含沙射影，他把文革的成就比作“秦始皇修长城”，虽然也抽象地肯定历史功绩及长城的作用，但具体地谴责他的“残暴的阶级本性和操之过急。”〔61〕出于这一基本认识，周泉纁于1967年10月公开贴出炮打陈伯达的大字报，声称陈伯达歪曲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利用群众运动搞乱了文革”。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对待群众运动上搞的不是“阶级分析”，而是极‘左’的颂歌，全民式的‘颂歌’；不是“引导”，而是“放任自流”。周泉纁的结论是：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和身负领导文革重任的陈伯达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是一个“窃国大盗袁世凯式的人物。”林彪，江青等人，是“极左路线的总根子”。在决定炮轰陈伯达期间，周泉纁及其四一四部分同学们聚会公开指责文革的发生“一则是个人集权需要，二则是排除异己”；“打倒‘刘家军’，换上了‘林家铺子’”。周泉纁还公开说：“别看这说出去非常反动，其实政治斗争就是那么回事。”〔62〕

虽然周泉纁以及四一四的伙伴们在公开的大字报上矛头只指向陈伯达，但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其实质是指向利用、愚弄并最终镇压了造反群众的毛泽东。周泉纁等人关于“政治斗争”种种肮脏黑暗的私下议论，正反映了这一代青年人在充当狂热盲目的毛的政治斗争工具后的冷静与清醒。尽管，周泉纁等人的“理想国”是朝后的一一文革前的十七年。但是，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环境下，青年人除了知道他们经历过的“十七年”或马克思书本上的巴黎公社外，还有什么其他可以参照的“桃花源”呢？象杨曦光、鲁礼安们一样，周泉纁对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独立思考也太多了，发表个人意见更太多了，因而他也很快被送入了社会主义的班房。然而，清华四一四们作为造反派的一翼对于十七年中共专制的留恋（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十七年是以刘邓等一批中共官僚为代表的），却明白无误地反映出这样一个信息：身处文化大革命无规则政治斗争及不间断的社会性动乱中的中国民众，在目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更黑暗更残酷的权术表演后，期望安定，希冀停顿，两害相权取其轻，连他们曾厌恶的“十七年”的官僚们都显得不那么狰狞可恶了。

这一微妙的信息，在1974年异端思潮集大成者——“李一哲思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可说是集中与扬弃了上述极“左”与右的异端思潮的特点。首先，“李一哲思潮”对于“林彪体系”的批判，可看作是伊林·涤西“反个人迷信”思潮的系统化；而李一哲对于文化大革命所有“新生事物”的全面否定以及对于“林彪体系确立的……一个文人既得利益的势力”——“四人帮”之流的全面理论清算，更远远超过了“联动思潮”与“怀疑一切思潮”的感性反抗。第二，“李一哲思潮”既坚持了“限制特权”的呼吁，但又恰如其分地指出：“我们的党员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这个特权阶层是客观存在的，是我国社会经济条件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产生的。”〔63〕尤其是“李一哲思潮”的反特权不仅指向十七年的旧官僚，更指向“大开后门”的林彪、“四人帮”及一切新官僚、暴发户。这不仅发展了遇罗克的思想，而且远比省无联的“红色资本家阶级论”有分寸和符合社会实际。第三，“李一哲思潮”既肯定了文革中人民反对十七年官僚体制的革命大民主，但又升华了清华四一四的“修整、巩固、妥协”论，主张在政治上安定，经济上建设，体制上民主。坚决反对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搞新的、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的“整顿”的一切阴谋事件（如黄帅事件，张铁生事件，批林批孔批周公事件等等）。这里，我们看到了“李一哲思潮”对“省无联思潮”、“北、决、扬思潮”的一个重要扬弃。后者在现实政治斗争上的理论认为，周恩来是右派，是文化大革命要彻底铲除的官僚阶级及制度的总代表。他的力量之强大使毛泽东不得不再迁回，退让，并把红卫兵、造反派作为他每次退让的牺牲品。与此相比，“李一哲思潮”超越了这一精神负累。如同《关于

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执笔者王希哲所解释的那样：

对文革中垮台的共产党的大批老干部，李一哲与造反派一样，认为他们是一批理应受到人民冲击的官僚，但他们不赞成“四人帮”为取而代之必欲置他们于死地的做法。因为他们感到，与其让一批满嘴胡说八道的暴发户，新特权阶层，新官僚上台使国家继续朝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极左走去，还不如让那些对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官僚重新上台，稳定和发展，宽松一些政治桎梏，对人民略为有利。因此，在文章里，他们毫不掩饰地为老干部直言，为周恩来说话，并公开地向‘四人帮’宣战……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中央文革要求批判李一哲思潮（注意：不是极左思潮，他们是分得很清楚的）的时候，共产党的老官僚们却表现出对李一哲的同情。〔64〕

应当说，李一哲思潮的右转和它对文革中极“左”派“新思潮”的扬弃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正是异端思潮趋于成熟的一个标志。然而，“李一哲思潮”作为文革中异端成熟的标志和现代意义上民主思潮的开始，更在于它提出了一些现代民主宪政的纲领性要求。就他们向四届人大提出的六点要求“1.要法制，不要‘礼制’；2.限制特权；3.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4.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制裁反动派；5.落实政策；6.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来看，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提高到法律高度，不仅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坚持人民的民主权利还在经济领域内也提倡切实可行的原则，已俨然是一份全面的雏形初具的异端纲领了。

当我们说文革中的异端思潮对平等，民主与法制进行了独立思考，其最主要的可贵之处是指这一思考本身的“独立”两字，而不是指这些思考所到达的高度。就其思辨的高度和深度而言，更多的仍是在马克思主义，甚至毛泽东思想的范围内。即便是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批判，也大多是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的。如同“李一哲思潮”的倡导者自白：“李一哲们并没有突破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框架，相反，他们仍然忠于这个框架并竭力企图表现对它的忠诚。他们仍然希望建立一个完美、理想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来。”〔65〕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他们其实是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不同政见者。其次，除了少数人（如遇罗克）外，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大多没有到达系统化全面化的水准。但他们有幸结合自己文革中的痛苦实际，对文化大革命终极目的的疑惑和对理论问题独立思考思考的本身，都导致他们走出了背离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关键的第一步。最后，尽管有一些异端思潮或多或少地正面批判了毛泽东（如“联动”思潮），但毛泽东本人对整个异端思潮来讲仍是批判的一个盲点。这一方面固然是文革中盛行的个人迷信对这些异端思潮的局限，造成它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表象，但从这些异端思潮的倡导者们的私下议论及觉醒历程来看，他们对毛泽东的错误已有相当的认识，只不过新思潮的轨迹常常沿着旧框框迂回奔突，“打着红旗反红旗”无论在意识和下意识中更容易被采用（这也是一种个人迷信的惯性）。无论如何，文化大革命中异端思潮本身，都向着一个独立于中共意识形态的，最终必然走向平等、民主、法制等健康的方向走去。

注释：

〔25〕遇罗克《出身论》，北京：《中学文革报》创刊号，1967年1月18日。

〔26〕遇罗克《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北京：《中学文革报》第四期，1967年2月21日。

〔27〕同〔25〕

〔28〕王晨、张天来《划破夜幕的陨星》，北京：《光明日报》，1980，9/12—9/22。

〔29〕《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译文载广州《人民之声》总第六期。

〔30〕漆豪《从李一哲大字报到天安门事件》，载李一哲原著，漆豪校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香港：和尚打伞出版社，1976年，第3页。

〔31〕同上，第50页。

〔32〕宣集文《对“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批判》，载玄默编著《李一哲大字报论集》，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1976年，第241页。

〔33〕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4页。

〔34〕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原载广州《广印红旗》1968年3月。

〔35〕鲁礼安《决派章程》，原载于王绍光《理性与疯狂》，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4页。

〔36〕《公社早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1967年2月，载上海市委写作班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反动思潮资料汇编》（1970年）。

〔37〕《造反兵团关于井冈山公社大反新思潮的严正声明》，1967年2月，同上。

〔38〕海枫《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香港：友联出版社，1971年，第329页。〔39〕毛泽东《关于陈正人蹲点报告的批示》（1965年1月25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1969年，第548页。

〔40〕同〔16〕。

〔41〕《论新思潮》，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42〕杨曦光《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43〕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纽约：《中国之春》，1990年12月。

〔44〕同〔34〕。

〔45〕冯天艾《怎样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原载武汉《扬子江评论》第十期，1968年6月12日。

〔46〕同〔38〕。

〔47〕同〔19〕。

〔48〕同〔34〕。

〔49〕同〔45〕。

〔50〕《反复辟学会宣言》，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51〕《一切为了九大》，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52〕《揭开山东省十七年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盖子》，载山东师范学院革委会《黄河评论》，1967年第3期。

〔53〕《关于组织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引自山东大学《红二二战报》，第三十九期（1968年4月10日）

〔54〕同〔53〕。

〔55〕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第199页。

〔56〕同〔40〕。

〔57〕《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中发秘字003》，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58〕乔伊，徐雅雅《联动事件始末》，载《红卫兵秘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第71页。

〔59〕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第203页。

〔60〕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3页。

〔61〕周泉纓《四一四思潮必胜》，《与周泉纓同志谈话纪要》，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62〕《历史的判决》，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63〕李一哲原著，漆豪校注《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香港：和尚打伞出版社，1976年。

〔 6 4 〕 王希哲《关于李一哲思潮》，洛杉矶：《中国之春》，1994年12月。

〔 6 5 〕 同〔 6 4 〕。

（未完待续）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本期责任编辑：	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
本期 校对：	钟 超（美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徐名扬（澳大利亚）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张雨田（美国）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国）	〈cnd-cm@cnd.org〉
《CND》总编：	熊 波（美国）	〈cnd-cm@cnd.org〉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LISTSERV@UGA.UGA.EDU（GB版）
并请注明：SUB（或SIGNOFF）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版）
并请注明：SUB（或SIGNOFF）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FTP）：[ftp.cnd.org](ftp://cnd.org)[207.151.78.100]：pub/hxwz
或 [canada.cnd.org](ftp://canada.cnd.org)[142.132.12.100]：pub/cnd/

hxwz

万维网服务站（WWW）：<http://www.cnd.org/HXWZ/>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